

黃埔將帥

第五卷

黄埔将帅

主 编 陈锡增 廖隐邨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浩气千古 壮烈殉国

——军事家左权

1942年6月中旬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、参谋长叶剑英和留驻延安的各将领，正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讨论着前方的战事，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进来，递给朱总司令一份电讯稿。朱总司令看了一眼，宽厚的脸盘突然严肃起来。他请大家肃静，然后沉痛地宣布：

“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刚刚接到前方发来的新华社电讯，我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5月25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。”

窑洞里的人都愣住了。朱总司令默默转身向着太行山的方向，其他人也摘下军帽，随总司令默立致哀。

左权将军，是八年抗战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。

走上革命路

小山冲里的田埂上，走着一队手举讨米狮子的小孩子，朝着正放着新年鞭炮的小村子走去。进到一个屋场，狮子先蹦进堂屋里，在“天地国亲师位”神主牌前行两跪六拜大礼，屋主人点起一挂土鞭炮迎接。几个孩子用稚嫩的童音唱道：

“狮子进门六个揖、六个揖，
口中含着羊毛笔，
上写天官赐福，
下写禄寿康宁。”

然后狮子扭头向正放鞭炮的主人舞去，边舞边唱道：

“狮子头上一点绿、一点绿，
多谢主家鸣炮竹。
炮竹落地就开花，
一发人来二发家。”

早有女主人进屋量出一筒米来，倒进背米袋子小孩子的米袋里。

讨米狮子出去了，又进了下一家屋场。从正月初一直到正月十五，小小狮子队要遍四乡八里，给人们增添过年的热闹气氛，也讨满了他们背上的小小米袋。

要讨米狮子是醴陵一带的风俗，少年的左权，为了给家里贴补零用，挣来读书的学费，也和几个本家小伙伴们一起拉起个讨米狮子队，在大正月里走西家串东家。

左权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茅岭的左家屋场一个贫苦农家，原名左纪权。左家世代靠佃种土地为生。1905年秋，左权刚半岁就死了父亲，靠本家相帮，母亲一人独自撑起了这个家。他在亲友资助下好不容易才上了学。每年正月，别家的孩子都穿新衣点炮竹时，左权他们几个孩子还要去要讨米狮子挣钱补贴家用。左权读小学的时候就十分聪明，很受老师欣赏。1915年5月9日，袁世凯接受卖国二十一条，消息传到湖南，左权听到老师的讲述，义愤填膺地在白纸上写下“勿忘五九国耻”几个大字，贴在背上，和同学们一起，边走边向乡亲们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径。

1916年春荒，左权的三哥到外婆家借米度荒，在路上因饥饿无力滑进水塘淹死了，使左权的幼小心灵，更增添了对黑暗世道的愤恨。

1921年左权考入县立渌江中学，与宋时轮、邓文仪等同班。左权家贫，因此穿戴得很差，常遭富家子弟的嘲笑。左权学习很刻苦，一次谈到班上的富有同学，左权对宋时轮说：“中国的社会就是怪，阔佬们的孩子有钱读书还不好生读，穷人的孩子想读又读不起，这样的社会非改改不可。”

五四运动也把新风吹进了渌江中学，学校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

支部和社会科学研究社,组织社员学习探讨社会改革问题,并从社员中发展培养党员。左权也参加了研究社的活动,开始接受革命思想。一次他对宋时轮(已是秘密党员)说:“创造社会农人有责,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,我是农人子弟,责任更重大。”

1924年3月,左权说服了母亲,同宋时轮、张际春、蔡申熙等几位同学背井离乡,赴广州投考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。

讲武学校设在广州小登峰路北校场西边,这儿虽属市郊,却也十分热闹。旁边有一座古庙,时值隆冬,可依然处处花团锦簇,蔚为壮观。左权和他的同伴,最爱闲来散步,观赏这里的木棉花。

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是当时的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,教育长是李明灏,学校监督是周贯虹,后设党代表廖仲恺。

陆军讲武学校第一期学生,招自两湖(即湖南、湖北)、上海的青年,共400余人。学生被编成4个队,左权被编在第1队第1区队,区队长林伯森对左权很赏识,每逢排教练、连教练,常常要担任排、连长,作示范演习。由于得到领导的重视,左权学习更加勤奋。

黄埔学校招生以后,陈赓、邓文仪、张际春他们都考了去。左权觉得讲武学校与滇军的学校比起来,还算说得过去,就坚持了下来。

11月,孙中山下令讲武学校归并黄埔学校,左权转入黄埔第一期,编在学生6队。

左权在黄埔学习十分刻苦,成绩优异,受到各方面的重视。

1925年,由同期同学、老乡陈赓的介绍,加入中国共产党,周恩来主持的入党宣誓仪式。

从黄埔军校毕业后,左权参加了东征。滇桂军阀杨希闵、刘震寰趁机叛乱,1925年6月,左权随东征军回师平叛。

左权的六连作为突击总队一部,跟随张治中抄袭反叛的十九路军敌指挥部。苏联顾问契齐班诺夫问担任突击连长的左权:“左,你准备怎么打?”

“潜渡上岸,然后分小组包抄敌人。”左权回答。

苏联顾问点点头:“告诉你的士兵,应不顾敌人的炮火,积极突

进,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倒叛军。”

左权向苏联顾问建议:“如果有炮火压制敌人的火力点,我们的把握会更大!”

“对! 炮。左! 你的意见很好!”契齐班诺夫似想起什么,跟张治中耳语一阵后,说:“我们手头的大炮都用在了主攻方向,不过,我们可以把飞鹰舰拖过来,用它上面的大炮试一试。”

战斗开始后,左权率突击连迅速冲向前去,敌人的机关枪立刻对他们猛扫。这时,苏联顾问契齐班诺夫正在指挥打炮,走到飞鹰舰的炮位边上亲自瞄准,然后下令:“放!”

这一炮果然很神,正好打中敌人的指挥部,叛军总指挥赵成梁当场毙命,敌人顿时群龙无首而大乱,左权率领突击队一阵猛冲猛打,叛军全线崩溃,逃不掉的纷纷投降。

留学莫斯科

左权在东征战斗中的表现,给苏联顾问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这年10月,莫斯科中山大学来中国招生,中共党组织和苏联顾问,都向主持招生人员极力推荐左权。不久,左权作为优秀军官被保送去苏联学习。

12月初,左权告别广州,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,与伙伴们一起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旅程,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十月革命的故乡——莫斯科。

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市内。莫斯科河西岸沃尔洪卡大街16号,是一座旧式的、但规模不小的四层楼房。楼房前面是大学的校园,有许多树木。左边是排球场,后边是篮球场,冬天可改成溜冰场。全楼共有一百多个房间。餐厅在一楼,图书馆、教室、学习室、办公室分别设在二、三、四楼。图书馆设备较好,藏书较多,当然绝大多数是俄文书。左权他们是中山大学的首批学生,就住在这座楼里。

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,是卡尔·拉狄克,是个有着波兰国籍的犹太人,一位托派理论家,喜欢在人前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高见。

拉狄克书生气十足,但责任心很强。每天上班很准时,见到中国学生主动打招呼,没有校长的架子,还亲自讲授《中国革命运动史》课。他每个星期讲二三次,讲课滔滔不绝,很能博得学生的好评。

左权在中山大学听过斯大林来校作的报告,并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1927年9月,左权由莫斯科中山大学,转到了莫斯科高等军事学府——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。

苏联陆军大学,又名苏联红军大学,也是闻名于世界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。这是一所苏联为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而设立的学院,苏联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曾在这里学习过。显然,当时苏联各

类学校有不少外国的留学生,但惟独这个学校是不容易进的。学院有规定,凡是进到这所学校学习的人,必须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,一般都需要先经过苏联高级步兵学校的学习和训练。但是,左权出众的才华和在基层担任过指挥的经历,使他得到了特殊的批准,与陈启科、屈武、黄济洪一起,由中山大学直接保送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,刘伯承此时也来这个学校学习,和左权分在一个班。

莫斯科中山大学及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两次学习,把左权培养成为一个既有军事理论,又有革命觉悟的红色高级指挥员,为他将来回到祖国,在中国战场上贡献自己的力量,奠定了厚实的基础。

左权到中山大学后,被分在第一期第7班,这个班上有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谷正纲、谷正鼎、邓文仪、杜柏生、吴淡人等,也有后来成为我党著名人物的邓小平、傅钟、李卓然、潘子力、朱瑞等。

就在左权刻苦学习的时候,传来了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消息。左权和进步同学愤怒声讨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背叛行为,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痛骂蒋介石为革命的敌人,要断绝父子关系。然而,左权的同乡、同学邓文仪和一批右派学生,公开支持蒋介石。左权把邓文仪的文章贴在墙报上,大书曰:“请看中大同学败类邓文仪的反动嘴脸。”

然而,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,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,借“肃托”运动之机,拉帮结派,排斥异己。他把一些托派分子挖出,也把一些平时不与他同流合污的同学指为托派,使这些人有的被遣送回国,有的被流放西伯利亚,还有的被押送劳动营或阿尔泰金矿从事苦役。

有一天,左权到孙冶方的住处和俞秀松、陈启科等同学共同进餐,席间气氛融洽,大家都无拘无束,谈笑风生。谁知道隔墙有耳,有人听到谈笑声,内中多为江浙口音,“革命警惕性”大发作,忙去告诉了米夫和王明。王明一听,联想到俞秀松、董亦湘、孙冶方、蒋经国这帮江浙人不买自己的帐,此时正好一网打尽,于是立刻想出个“江浙同乡会”的名目加在这些人身,对米夫添油加醋地解说了一番。米夫是只要看见三个人在一起就怀疑是合伙反对他的,听了王明的话,

立即相信有个“江浙同乡会”的反动组织正在密谋反对自己、反对斯大林,于是让王明告知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格别乌,派人会同学校审查。

左权哪想到一起吃顿饭也会招来天大罪名。他被王明“册封”为“江浙同乡会”的“卫士”,简直觉得莫名其妙,他急忙申明从不知有什么“江浙同乡会”的小组织,更谈不上当什么“卫士”了。然而,使他气愤和伤心的是,他越辩解,那帮人越认定有这个组织,越认定他是其中一员。1928年4月,时任中共负责人的向忠前来中山大学讲话,他以工人阶级大老粗自居,听信王明一面之词,破口大骂“反党、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”,要把“江浙同乡会”的“头子”拉出去枪毙。左权他们百口莫辩,又气又急,只好不断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申诉,要求调查。1928年秋,上级经过审查,确定不存在“江浙同乡会”组织,但结论挂了个尾巴,说是部分同学有感情的结合,“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”。结果,在1929年底苏联清党运动中,王明以此为口实向斯大林进谗言,把俞秀松等人抓起来了,一些人也莫名其妙地“消失”了。左权被指为“行动不检”,挨了个党内劝告处分。左权当然知道这盆从天而降的脏水是从哪儿来的,他对王明这种不择手段、打击异己的卑鄙手法极为气愤,但投诉无门,只好长吁短叹。

1927年9月,左权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,与刘伯承、陈启科等同班。1930年4月,左权以优异成绩毕业,奉命回国。5月,他和刘伯承、屈武等分头从绥芬河入境。左权化装成一个俄文教员,头戴鸭舌帽,穿着蓝呢子大衣,鼻梁上架副镀金圆框眼镜,手提俄国皮箱。到了大连,左权赶紧直赴约定地点。等了一会儿,远远看见刘伯承过来了,却没有朝这边看自己一眼。左权正想走过去,突然发现刘伯承身后几米处有一个人,头和身子都裹在高高的大衣领子里,两个眼睛紧盯着刘伯承,不紧不慢地跟着。左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过去了。看来刘伯承已注意到了身后的可疑人物,故意带着“尾巴”来接头地点给左权看。左权跟在他们后面,看见他们进了一家杂货店,左权也赶紧进去,在一个柜台前站住,故意让刘伯承看见,两人

顺柜台慢慢靠拢,错肩的时候,左权用俄语低声说:“有狼,出去后钻巷子。”刘伯承也轻声说了个地点,然后带着“尾巴”出去了。一会儿,左权也跟过去,看刘伯承一过去,突然闪身出来,跟“尾巴”结结实实撞了个满怀。“尾巴”被撞得眼冒金星,却来不及发火,匆匆紧走几步去找目标,哪还有人影?等他醒过神来找撞他的人时,左权也早没影儿了。

甩掉了“尾巴”,他们在预备接头点会合后,急忙离开大连,到达上海,找到了中央。

等了几天,老同学陈赓突然出现在眼前。陈赓戴着黑礼帽,一身中山装,活脱脱一个国民党党棍,如果不是那熟悉的声音,简直不敢相认。久别重逢,两人心里自然十分高兴。然而身处险地,没有长谈的时间。陈赓通知他,几天内赶快离开上海。原来,与他们一同回国的黄第洪叛变了,写信给蒋介石,卖友求荣,甚至准备配合密探诱捕周恩来。不料他的行踪被陈赓领导的特科发觉,于是通知左权他们火速转移,想法去苏区。离沪前夕,左权给家里写信说:“我虽回国,却恐十年不能还家,老母赡养,托于长兄,我将全力贡献革命。”

等左权他们一离开,陈赓带领“打狗队”设计把叛徒黄第洪除掉了。

左权进入闽西苏区后,担任过军校教育长、红军军长、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处长等职,多次指挥部队打胜仗。

然而,一团阴云正向左权袭来。

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,王明倚仗米夫的支持,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。他上台伊始就极力推行“左”倾冒险主义,对内大搞“肃托”、“肃反”,使中国共产党和年轻的红军元气大伤。

1932年6月,左权被人告发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文件,被撤消了红一军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,调到红军学校去当教官。组织部、保卫局先后找左权去谈话,左权苦不堪言。其实那份文件是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别人的,左权为防扩散才取出文件交专人保管,不久自己调走,文件的下落就不知道了。可是这种事就有这种魔力,

只要沾上身,就再也说不清、道不明了。王明的代言人进入苏区后,左权的问题竟升格了,组织专案调查。审查左权的会议开了整整3天,由项英主持,会议期间,那个子虚乌有的“江浙同乡会”也被人搬出来了。左权的辩解没人听,反而当作他心虚的表现,认定他参加过托派组织。幸而左权在苏区表现极好,领兵打仗几乎每仗必捷,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当反革命从肉体上消灭,只给予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。

可是这种磨难还不算完。1938年在党的六届八中全会上,王明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,还恶狠狠地质问:“左权这个人有问题,是个托派,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?”一直到牺牲,他的所谓“托派”问题也没个完。当彭德怀跟左权谈起王明的质问时,左权紧皱着眉头,闷闷不乐地说:“只要王明在中央,我就翻不了身。”

一位党的忠诚战士,竟然被这清白之冤缠绕终身,这是多么可悲的事!

长征路上

王明这帮人，只会空喊革命口号。搞政治斗争，拉帮结派、整人夺权，他们有一套。真正到战场上与敌人拼杀，他们就显得外行和无知了。

1933年冬，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，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。几次失利，敌人学乖了，搞什么“碉堡推进”、“步步为营”。王明“左”倾路线的执行者，抛弃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，强令红军死守，“以阵地对阵地”，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。红军没有重武器，枪里没几颗子弹，多的是土家伙：土枪、土炮、土地雷，声音唬人，威力不大，奈何不得敌人的坚固堡垒。而红军好不容易筑起来的堡垒，被敌人重炮一轰、飞机一炸，就像洋娃娃的泥巴屋一样塌下来，反而增加了伤亡。原来行动飘忽、使敌人苦于像雾一样难以抓到的红军主力，如今却送到敌人眼前去挨打。红军损失惨重，尤其干部消耗巨大，难以补充。

然而，左权却被闲置于后方。知学生莫如老师，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听说了左权的遭遇以后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左权这么年轻，会有什么问题呢，应该让他到前线去指挥部队。”恰好这时红一军团参谋长被派到别的根据地去了，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的推荐下，中央军委重新使用左权，任命他为红一军团参谋长。左权不计个人恩怨得失，愉快地服从安排，走马上任。

1933年12月底，左权来到一军团驻地报到。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对新参谋长的来到非常高兴，通知伙房搞几个菜，做一桌年夜饭招待招待，以示欢迎。时近傍晚，饭菜上桌。当时条件异常艰苦，这桌年夜饭也只是些战士们捉的泥鳅、黄鳝，摸的田螺之类，左权和林彪、聂荣臻他们一看已是高兴得很了，连称是难得的“牙祭”。几个人你谦我让刚坐定，左权突然一把抓住聂荣臻的袖子就往外拖，边走边喊：“快走，鬼头苍蝇来了。”几个人嘻嘻哈哈不在意，再看左权一脸

焦急,不像开玩笑,这才急忙跟出来,一出门才听到“嗡嗡”的飞机轰鸣声。刚冲到门口大树下。飞机就投下了炸弹。等几个人从地上抬起头一看,房子就剩了半截泥墙和一团浓烟,好不容易盼到口的“牙祭”也没影了。聂荣臻气得骂道:“龟儿子的技术倒不差!”一边的警卫、参谋则为军团首长安然无恙而庆幸,也为这难得的年夜饭而惋惜,左权笑了笑说:“没有什么关系。这顿年夜饭没吃到,总还是看到了嘛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

虽然前方将士浴血奋战,也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,但已无法扭转由于“左”倾路线造成的不利形势,被迫放弃根据地作战略转移。红一军团由兴国前线退到瑞金宽田集结,10月16日告别了苏区父老乡亲,跨过于都河,踏上了茫茫长征路。

1935年1月,红军强渡乌江,攻克遵义。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。这次会议,结束了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,毛泽东重新参加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。当聂荣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左权时,左权高兴得流下了眼泪,他对聂政委不住地说:“中国革命有救了,中国革命有希望了!”

从此,红军又开始使国民党军队难以捉摸了。一次次的佯攻、奔袭,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虚实。红军四渡赤水河,巧渡金沙江,佯攻贵阳,威逼昆明,搞得敌人手忙脚乱。接着红军虚晃一枪,突然掉头北进,经会理、德昌、西昌,进抵泸沽。前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,对岸有川军杨森部队坚守,后面,上了当的几十万国民党追兵正急忙扑过来,红军如能抓紧时间渡过大渡河,将能把追敌远远甩在身后。如果耽搁时日,敌人追上来把红军围堵在狭窄的沿河地区,那就危险了。大渡河边,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全军覆没之所,蒋军狂叫要让红军成为“石达开第二”。为迷惑当面之敌,军委命令左权率少量部队向大树堡前进发动佯攻,钳制和吸引河对岸富林的守军,红军主力则准备夺取冕宁附近安顺场渡口,抢渡大渡河。5月22日,左权率领佯攻部队大造声势,攻占越雋县城,在城里到处张贴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,使敌人产生红军主力到来的印象。左权带着警卫员和侦

察科长刘忠走进县衙门，县长和县政府官吏早已闻风而逃，里面却还有一个彝务科长在办公。左权觉得奇怪，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跑呢？”

彝务科长答道：“报告红军长官，我要看守野人，不能随便离开。”

左权对他的认真劲倒有点好感，只是有点不明白他说的野人是什么。彝务科长解释说，野人就是质彝。从清朝以来，为了镇抚彝族地区，就勒令彝族各头人须送家族一男子为人质，以示服从，国民党当局也沿袭坐质制度。

左权听完介绍，马上说：“你走吧，我要下令把他们放了。”

彝务科长一听着了慌，忙说：“红军长官，放不得，放了他们野人就晓得杀汉人。这些人都不开化的。”

为慎重起见，左权让彝务科长挑选一些质彝代表到县衙谈判释放问题。左权告诉他们，并不是所有汉人都歧视彝人。共产党反对大汉族主义，主张民族平等。共产党和红军同意同彝族同胞团结起来，共同去打压迫他们的官府、军阀。左权看他们还有疑虑，不相信地面面相觑，就诚恳地说：“红军不但放了你们，再不许搞换班坐质，还要打倒剥削你们的汉人财主，把他们的家产分给你们。”

这些彝族同胞这才相信共产党和红军真的要放他们，不禁欢呼起来：“红军瓦瓦苦(万岁)!”“红军开监了，要放倮倮了!”

左权命令大开牢门，把人从暗无天日、又潮又脏的牢里都放了，帮披枷戴镣的人把刑具都除了。彝民欢呼雀跃，主动带路，左权率部在彝民帮助下，追上了逃跑的越隼县长和守军，县长当即被愤怒的彝民砍下了脑壳，守军则被剥光了衣服，抱头缩肩地在地上发抖。左权和刘亚楼看着这些赤条条的汉子，又好气又好笑，指示三营营长梁兴初，把俘虏收容下来，让战士们匀衣服给他们穿上。俘虏们一个个对红军战士千恩万谢。

左权的这个行动，使红军的仁义名声传遍了彝族山寨，对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左权率右路纵队从泸沽到达大树堡，400余里崎岖山路，斩关夺

隘,只用了不到5天时间。左权和各部首长大摇大摆沿河勘察渡河地点,修工事,备粮草,又召集民工大造竹筏木船,大造北渡攻打富林的声势。富林敌军惊惧不已,飞章急电到杨森处求援。等敌人手忙脚乱调兵时,左权又奉命迅速靠拢大部队,赶到安顺场渡河。安顺场渡口狭小,船小浪急,红军又两岸并进,夺取天险泸定桥。6月3日,红军浩浩荡荡通过泸定桥北上。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刘伯承、左权健步走在桥上,耳畔传来大渡河的咆哮声。毛泽东笑着说:“心脏衰弱的人是过不了这种桥的。”左权兴奋地说:“大渡河就是一条龙,我们今天也骑在龙的背上了!”

红军飞越大渡河,前方再没有能阻挡红军北进的有力部队。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。1936年2月,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,左权代理一军团团长。

1936年10月,红二、四方面军北上,与中央红军会师甘肃会宁。蒋介石惊慌万状,极欲乘红军长途远征,部队疲乏,立足未稳之机,一举歼灭红军,连电催促前方部队抓住战机,一蹴成功。尾随红军的“马家军”遭到过红军打击,心有余悸,不敢放肆逼近;东北军也吃过红军苦头,也不愿打内战,行动消极;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,立功心切,穷追不放。左权和胡宗南以及他手下的两个师长丁德隆、李铁军都是黄埔一期同学,跟丁德隆尤其是湖南同乡、湘军讲武堂同学和黄埔一期6队的同学。左权以黄埔军校同期同学的名义,给他们3人都写了信,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,泯息内战烽烟,与红军携手抵抗日寇的侵略。并表示,红军的退避三舍,不是不能战,而是给他们以自省时机。如再苦苦相逼,红军只有奋起自卫一途。到那时玉石俱焚,悔之晚矣。

可惜他的这3个同学铁心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效命,自以为手握钢铁大军,而左权已被赶进了陕甘高原大山沟里,不日就擒,因此竟拿左权的信开起了玩笑。然后他们以胡宗南的名义回敬了左权一封公开信,要红军放弃阶级斗争,卷起苏维埃红旗。第一军部队不顾友邻的迟疑,孤军深入。丁德隆的七十八师大摇大摆地闯进了红军

的袋形口子里的陇东山城堡，给红军创造了全歼孤军的机会。红军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难得的良机。

按照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决定，参战部队由红一军团统一指挥。身为代军团长的左权将在战场上跟老相识丁德隆较量较量了。丁德隆向来被人誉为文武双全的儒将，他也确实多才多艺，打仗是把好手。他曾在川北广元一带跟一期同学徐向前部队打了一仗，双方损失惨重。但红军补给困难，而蒋介石嫡系则能从损失中迅速恢复，因此这一仗可算丁德隆占了便宜。这次贸然急进山城堡，虽然态势不利，但他自恃武器装备精良，士气正旺，又有空中支援，竟然准备死守不退，在周围山头上修满了防御工事，利用堡垒和天然障碍筑起了一道坚固防线。

左权仔细权衡了敌我态势，他对部队将士分析说：“打正规战、阵地战，敌人有优势火力，大炮、机枪、轰炸机，我们吃不消，攻坚也不是我们的拿手好戏。红军擅长的奔袭、夜战。我的这位老乡、同学，已经把他的优势摆在那儿给我看了，我呢，也准备把红军的优势拿出来给他看看。”说到这儿大伙都笑了，左权又说：“这次给他见识见识红军的夜战本领。黑夜里打仗，他的大炮、机枪、轰炸机都成瞎子，有劲没处使，只要我们行动隐蔽、迅速，等他发现我们时，一切都晚了。单兵独立作战、近战夜战，敌人不行，我们可以趁夜取胜，趁乱取胜。”

在左权的周密布置和指挥下，11月21日夜战斗打响，敌人的大炮、机枪成了摆设。红一师师长陈赓带着一个突击团，人手一把大刀，摸上敌人阵地，见人就砍，敌人手上的兵器在暗夜的近战中成了吹火筒，只得慌忙逃窜。到第二天清晨，熹微的晨光接替了朦胧的月光时候，敌人的主要阵地就全被红军占领。天亮以后，敌人的飞机来到了战地上空，此时在战地等着他们的只有一团团燃烧的烟雾和同伴们狼籍的尸体，红军大队早已凯旋了。

这一仗，狂傲一时的丁德隆，败在了左权、陈赓等老乡同学的手下，又羞又愧，从此不再问兵，自己觉得希望尽失，潜心佛学，钻研易经去了。山城堡一战，红军声威大振，坚定了张学良、杨虎城停止内

战、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的决心，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。

左权用一个又一个的胜仗，报答了恩师周恩来的知遇之明。